

論美國的日本政策

孫德湘譯

——美國正在與日本玩弄一套危險的把戲——

尼克森訪問北平對日本的影響

倘使一年以前，有些怪異而具有先見之明的日本人常常担心或憂懼，「美國可能未經日本居間調停，甚至在日本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安排與中共修好」，美國人也許會覺得，這簡直是顛倒是非與荒謬絕倫的想法。但，去（一九七二）年七月十五日，這些日本人看到，此一「惡夢」（Nightmare）真的實現了。

尼克森總統突然宣佈訪問中國大陸使佐藤政府特別感到可怕。為對付華府這一煞着（Washington's heavy hand），佐藤及其前任者已竭力擋住了日本的知識分子，左翼政黨及自民黨本身的壓力，迫使日本採取較獨立行動，使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

因此，尼克森這一宣佈引起憎恨是很自然的。那些堅決支持美國領導的日本人，他們感覺已被「出賣」（to feel betrayed），那些對美國較不友好者則稱呼尼克森此舉是一種「解放」（to hail as a liberation），認此乃日本追求自主政策，而終將擺脫美國控制的藉口。但，無論是出賣或解放，其影響是相同的。對中共採取獨立行動路線的壓力現在是不可抗拒的，因為尼克森突然訪問中國大陸雖未徹底摧毀，但却已損害了雙方結盟的互信。

在尼克森總統突然宣佈「中國」之行一個月之後（同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又獲知了美國的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很明顯旨在打擊日本的貿易利益。此乃增加日本懷疑的另一行動。

然後，日本又被征召，從事於阻止中共進入聯合國的努力。這一努力單憑美國的活動是註定失敗的。

此外，在較不明顯方面，尼克森政府也對日本人表現出，與日本的關係及友誼在美國的優先名單上，排名很低（low on our list of priorities）。不願日本人要我們派遣一位有經驗的資深外交家駐節東京的願望，俾可作深入的交談；相反地，總統任命一位毫無外交經驗的商人殷格索（Robert Ingersoll），出任駐日大使。

為向日本重申保證，季辛吉兩週前訪問日本並與佐藤首相會談。但，此一兩次被延擱的訪問，似乎是一勉強的事後補救行為（a grudging afterthought），不起多大作用。

更重要的，尼克森總統新近的若干聲明曾直截了當地否定了聯盟關係；這是在安保條約之下，否定了日本已久認為當然的事情。在日本，那些揭發美國政策基本含糊不清之處的評論，值得我們極端審慎地予以檢討。日本也許在探索美國基本立場的重大改變方面，較我們美國人更具警覺性。

多年來，美國把歐洲的安全主要寄望於「北約」（NATO），同樣把遠東的防務則寄望於與日本、台灣及韓國的結盟。美國認為，只要中共仍屬自願不暇（to remain introverted），同時與蘇俄的談判集中於世界的其他地區，如此似乎沒有理由要把日本列入巨人外交之列，一如我們把西歐盟國列入有關大西洋地區安全的決策之內一樣。

但，大多數日本人則認為，有關亞洲權力關係的任何巨強談判，美國事先一定會與日本磋商；換言之，美國應把日本當作真正的盟國看待。

可是，有關這方面的信心已因尼克森宣佈訪問中國大陸而動搖，又因尼氏於本年一月三日接受紐約時報記者訪問而發表的大戰略思想而受到損害。尼氏談話的離譜之處（his point of departure）乃是他的五大超級強國觀念（the conception of five superpowers）。這是尼氏於六個月前在堪薩斯城首次發表的。總統當時告訴記者稱：

「我們必須記取，在世界歷史上，我們唯一能獲得長期和平的時代乃是一個具有均勢存在的時代。當一國較其潛在的敵國變得無限制強大時，戰爭的危機即已發生。因此，我深信，美國在世界上是應該保持強大的；但我也認為，倘使同時具有強大與健全的美國、歐洲、蘇俄、中共及日本，彼此相互平衡而不是玩弄一國來對付另一國，則這個世界將更為安全美好（each balancing the other, not playing one against the other）」。

就是最後這幾個字，使日本人頗感驚異焦慮，因為五個超級大國相互制衡的觀念似已清楚證明，美國的政策已在基本上有所改變。在宣佈其訪問中共而不與日本磋商已清楚表示，美國沒有把日本當作盟友看待；現在，在所謂「五強制衡」觀念，尼克森已清楚表示，他無意把日本當作盟友看待。至少，日本人具有這一想法。

因此，現在許多日本人認為，尼氏與周恩來的十五小時談話以及季辛吉前二次訪問周恩來的更長談話幾可確定，美國已與中共獲致諒解而損及日本的利益；這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人認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尼氏飛越五千哩而在中國大陸逗留八日之久，僅僅是為了把大使級的談判從華沙移至巴黎，為遊客訪問長城作安排，拿野牛來交換熊貓而已。

中國文化對日本的吸引力

由於上述種種結果而使懷疑演變為不信，致使美國對日本安全承諾的可靠性產生動搖；同時也促使日本要與北平的關係正常化。日本對中國文化感有深刻的親和力（deep cultural affinity）是十分明顯的，這種親和關係對日本人來說，幾乎是一種責任。舊時把日本比作羅馬而把中國比作希臘，實在還不够適切（the old comparison of Japan as the Rome to

China's Greece is far from the mark）：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精深博大（the depth and richness of China's civilization）仍具有嚴肅的尊敬。此外，日本人對中國尚懷有一種歉意與犯罪感。十九世紀末，日本參加列強蹂躪中國，從一九三一年侵略滿洲而至二次大戰，日本要對一千五百萬中國人的死亡負責。

但，驕傲與犯罪感不是故事的全部。此外，在日本有識者圈子裏，他們對日本於百年前在經濟與政治發展方面，選擇了西方的型式而背棄其亞洲傳統，表示遺憾；這一說法，在日本頗為時髦。因此，若干有思想的日本人現在建議稱，倘使日本的現代工業社會有些顯得空虛與乏味（empty and insipid），這是因為日本背棄其精神祖國（中國）的豐富文化，而沒有吸取多少西方的價值所致。即使到了今日，日本是否應該再去探索豐碩的中國文化，仍是人們談論的問題。

無疑，這一歷史與懷古的奇異結合（this strange chemistry of history and nostalgia）演發出一股爆炸性的政治力量，似註定要把佐藤的繼任政府驅向北平。你也無法從日本社會那些較為現實者的裏面，可望對此具有阻力；因為大多日本工商業者，仍以中國大陸為所需原料的來源，而且一旦中國人民大眾的所得獲得改善，殆為一潛在的市場，具有無限的購買力。

美國政府似尚未考慮到，日本迫切要與北平修好將鼓勵中共領袖抬高代價，而美國則將失去制衡力量，以緩和談判的結果。中共對這一談判的條件是可以預見的：雖則中共當局接納尼克森總統是沒有台灣問題作為先決條件，但對東京則明白表示，除非日本承認北平是中國人民唯一合法的政府，承認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並廢棄其與國民黨政府所締訂的和約，雙方關係正常化的談判無從開始。

這些先決條件的頑強顯示，談判本身將是艱辛與持久的，而且主要是涉及政治性的。雖則過去有所傳說，北平要求賠款五百億美元（此一數字顯屬無稽），中共後來似把此一要求降低；很可能，中共將在精神與政治上尋求補償，堅持日本應作羞辱性的道歉，並提出條件將深深影響美軍在遠東的地位。

自美日安保條約修訂生效後，在現行的安排下，美國在日本的空軍基地

，包括琉球在內，僅能在日本政府同意之下方可使用。美方戰略設計者認為，倘使美國有必要保衛台灣或南韓，這種同意是可以獲致的。

但，時至今日，這種「認定」(assumption)是不見得靠得住的；因為北平不見得會同意，如果日本撕毀其與中華民國締結的和約，而仍容許美國使用日本的基地，以保衛台灣。就基地本身而言，這種拒絕不見得具有多大的實際重要性，尤其倘使尼克森已獲中共承諾，將不以武力對付台灣（此點多數日本人相信）。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共不可能不顧北韓的利益。它們已清楚表示，要把大國勢力逐出亞洲大陸；雖則由於蘇俄在其邊境虎視眈眈，它們可能不會逼得太緊，但共黨世界的動力很可能迫使它堅持，日本基地不允用作防衛南韓之用。

如果日本默許此等要求，則將對美國遠東安全體系的心腹具有打擊。美國可以不需使用日本的基地而動員其海軍力量來保衛南韓與台灣，這畢竟是無濟於事而不能解決問題的。

因此，我們必須面對此一現實，美國擺在日本的軍力，也許會在我們遠東的關係方面造成危機。倘使日本政府甚至不願與我們作必要的消極合作而使美國空軍得以踐履其太平洋承諾，此定將減低美國對安保條約的熱情而危及美日的整個關係。

但，這不過是事情的一面而已。美國必須自問：現在這些正在行動與發展中的力量，對遠東實際政治的高深學理而言，究竟具有何種終極的意義？回答這一問題，人們必須顧及一項動人的事實：日本的歷史不能像其他國家的進步情形一樣，可用相同的曲線來表示的；相反地，它無寧是許多連續的直線，週期性為若干銳角所切斷，當全國以全速前進時，會突然轉向而朝一新的方向前進。

在人類歷史的經驗方面，沒有東西可與日本人這一善變的情況相比。從七到九世紀，日本抄襲中國文化與政治體制，創造了它自己的文化；到一六三八年，因懼怕西方思想的感染，就斷然與世隔絕而孤立了二百年；直到一百年前，日本突然再度改變，以維新世代的姿態出現，不僅抄襲西方的科技，也借用與其傳統完全陌生的政治制度，而此一制度日本只懂得一部份。取得了西方的武器而仍保有其好鬥的傳統，把日本驅向一條黑色帝國主義的道路；就是這一道路導致了朝鮮、旅順與大連、滿洲、珍珠港及廣島等事件

，直至「密蘇里」號戰艦的全面投降為止。

一旦羞辱的失敗之後，緊接着來了佔領時期，日本又有另一次轉變而使專家們感覺迷惑。由於對戰前的體制失去信心，並由於為毛澤東所竊據的中國所排斥，日本一變而尋求會擊敗它的美國的保護，而把對權力的追求昇華或淨化為壯觀的工業成就。過去二十年，日本沒有改變。作為一個新興的工業國家，日本牢牢地把視線固定在西方，並壓制中國大陸吸引力的死灰復燃。

但，這畢竟是一段奇特而令人難以滿足的時期。日本雖在很多方面證明其在西方工商業領域的優越性，可是日本人永遠不認為，他們是西方社會的真正成員。這裏，我們不妨套用一句老話：「日本是一個追尋它自己的國家」，倒具有若干真實性。

這一追尋將把日本帶往何處，這一轉向將會產生何種結果，現在尚難斷定。但很明顯，傾向中國大陸清除了一切有與蘇俄結盟的跡象。與蘇俄結盟永遠沒有太大的可能性，因為不喜歡俄國人在日本歷史根深蒂固。本世紀初的日俄戰爭在外交上的挫折留下了痛苦的回憶；四十年之後，俄國人又在雅爾達背後刺傷日本，撕毀中立而攻擊日本。無疑，經濟利益可能具有若干抵銷作用；但，日本雖喜歡領先探測與開發西伯利亞的天然資源，包括油礦與瓦斯，可是把經濟的抵押交給一個對日本具有嚴重軍事威脅的國家，恐非日本所願。

但，在「中國」方面，這些顧慮均不存在；所以，日本與中共修好的時機已經成熟。日本人看來，尼克森訪問北平明白顯示，美國不再視中共是一擴張的國家。到頭來，五角大廈堅持「圍堵」中共的狂想，於一九六五年林彪發表其著名的「民族解放戰爭」而抵達高峯，已向一項重申保證的信念低頭，此即中共的主要關切在中立地區或第三世界及其本身疆土的完整。日本人歡迎這一分析是毫不奇怪的，因為它給予日本自己對中共的看法有所依據。日本人擔心蘇俄擴張海軍的野心，但中共則由於其國內問題、其核武器有等於無、其海空軍則微不足道，似對日本沒有迫切威脅可言。

日本與中共關係的可能發展

一旦雙方對正常化條件的爭辯與討價還價過去後，此一爭辯可能為時甚

久，一種類似「蜜月」的時期可能會到來，日本將為正常化關係而付出「中立」的代價；而中共則將吸取日本的潛力，作為其技術與資本的來源。但，這一結合不見得會形成多大的生存價值。一個落後的中國與一個致力於工業發展的日本，兩者的關係幾乎定將導致遠東領導權或支配力量之爭，而這一個競爭將使中國的廣大人口在整個亞洲來對抗日本日增的經濟力量。

兩個如此自大而具有地區性控制力量的國家的競爭是無可避免的。中共定要掌握其自身的經濟發展而不願依賴其所不能信任的日本，兩者對原料的急劇競爭已有所聞，例如對中國海藏油源之爭，此無可避免將導致嚴重的分歧。

這種分歧雖不會捲入軍事，但由於中（共）日兩國的利益在多方面有所衝突，由於日本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心漸趨消失，並由於蘇俄試圖填補因美國退出所留下的真空，寄望日本永遠不把它額外的工業力量轉變為傳統的軍事力量，這是十分不切實際的。

日本的建軍與核子化問題

當然，日本決定建立一支全面軍力將遭遇國內可怕的反對，但重行武裝或軍事化（re-militarization）的憲法障礙已失去其重要性了。在麥帥（Gen. Douglas MacArthur）堅持「日本永遠不能保有陸海空軍」這一諾言載諸日本憲法第四條七年之後，此一「自己拒絕」建軍的立法已被解釋，可以容許保有適度的自衛力量。

今日，由於日本的繁榮正與我們的新孤立主義同時發生，美國不喜歡日本佔我們安全承諾的便宜（resentment at Japan's free ride on our security commitment）已經日益見諸言詞了，甚至美國現在似在促使日本，去做我們過去決不容許它做的事情；尤其自尼克森主義宣佈後，我們建議日本應擔負更多防務責任的「耳語」（sotto voce），已發為大喊大叫，結果使日本摸不清美國的眞意。

同樣，日本也不再重視尼克森政府的正式聲明，建議日本應增強其軍事設施，足以保衛外力對日本本島的侵略。賴德國防部長新近竟自主地發表軍方對此一問題的意見指出，日本可能需要在印度洋派出一支艦隊，藉以保護

其從波斯灣的漫長海道；同時，國防部的幕僚則建議，日本的核子化也許是必需的。

雖則後一（核子化）說法終於被否認，但却在日本取得了一種試探性的信念，因為美國政府新近顯示出，已改變其對防止核子武器擴散的立場，至少已在策略方面有所改變。美國已不再促使日本批准此一條約，而代之以由日本自作決定。就正統外交術語而言，這一立場可能是正確的，但却與美國政府在美日雙邊經濟談判中的態度尖銳不同，致多數日本人相信，美國已不再關心限制核子國家的數目了。

所有這些加深了日本對核子武器的迷惑。反對日本成為核子國家的輿論仍很高漲，但人們不可低估日本國內的政治苦悶（the internal political agony），日本可能面臨修改憲法，以走向核子化之路。在這一方面的壓力已經增加，尤以中共的洲際飛彈（ICBM）已經發展到使用階段，射程可以抵達北美的目標，那些懷疑者這樣問：「誰會愚蠢到這樣程度去相信，美國會冒其本國被核子武器攻擊的危險來保護日本？」這是戴高樂的老調，但對日本則具有特別影響。

再者，要使日本成為核子國家的最大壓力不是對安全的焦慮，而是對政治地位的一種慾望。警覺性很高的日本人，鑑於允許中共進入聯合國這一事實，適巧安理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正是五個具有核子武器的國家；而且日本人也注意到尼克森聲明的暗示，「他的北平之行是有其必要的，因為十五年或二十年之後，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有成爲核子大國的危險」。

顯然，這不是能力問題。日本選擇作爲核子國家，除了可能牽涉社會與政治的紛擾外，日本無疑具有科學的適任性與工業的能力，在短期內即可建立一個適度的核子兵庫。爲一般所熟知的工作原則，即所謂「N-2」目標。該目標意指，日本將經常保持其技術趕上時代，俾作成決定時即可於二年之內，製造可資使用的核子武器。

此一原則自爲日本商人所歡迎。他們相信，核子武器的技術將爲私人工業提供有價值的刺激。日本政策的形成正如繁複的高級代數一樣，重工業的負責人（經理）是施壓力促使日本重行武裝的主要因素；同時，當美國繼續推動，要日本增加其軍事費用時，就某種程度而言，也增加了他們的聲勢。從美國自身的經驗，我們應可充份明白，像日本這樣一個高度工業化的國家

，要它長期向我們購買它自己能製造的軍用物資，這是不可能的。我們決不能無視於一項事實，即日本工商業與政府關係的構造，其所以能够如此親和，都是爲了演生軍事工業的複合組織而設置的。

倘使日本選擇作爲一個核子國家，則它將是怎樣一個核子國家？對此一抽象問題，它的回答可能如此：「沒有什麼了不起」。這是美國政府高級官員的意見。因爲，目前已有五個核子國，核子僵局似仍有效，多一個日本似無大礙，美國不值大驚小怪。

檢討美國對日本的政策

但，像一切國際政治問題一樣，此一問題不是如同無結果的學術問題而發生，而是在多彩多姿與特殊意義的前提下而發生。這樣，從我所描述的情況，很明顯日本唯有在其感覺爲西方所「拒斥」與強烈國家主義的情況下，才會走上核子化的道路，而這些情況將使日本的核子威力具有破壞性與毀滅性。

就是這一關係，使美國新近的行動特別顯得粗心大意。眼見一個核子化而與西方深相結納的日本，是一回事；要來對付一個爲西方所拒斥而具有核子武器的國家主義的日本，則完全是另一回事。像日本這樣一個大國，既無固定的根基而又憑自己在轉變，在世界政治可能是一不可捉摸的力量，其對遠東安定的威脅，正如一艘航行大海的孤舟而具有敞開砲衣的大砲。果真如此，美國爲什麼要讓魔鬼跑出瓶子（to let the genie out of the bottle）？

我們未能認清日本在國際政治未來重要性的一項原因，乃是多數美國人所面對的日本人，似均係眼光短小心胸狹窄的「生意人」（economic man）。這也是日本人的不幸，他們往往以短時間並太過實用主義地來描繪聲名狼藉的美國人。

至於說日本人在經濟術語上心胸狹窄，我們美國人暴露了一項思想的偏見，這一偏見時常導致我們走入歧途。美國人輕信馬克斯主義者的說法，所有國家（美國當然除外）形成其外交政策均與其經濟利益一致；其實，歷史事實適爲其反。這樣，美國就被這一說法誘惑而認定，由於美國目前乃是日

貨最重要的唯一出路，我們就可隨心所欲爲所欲爲，因爲日本沒有其他出路。

但，傲慢、國家主義及時常露骨地失去理性，較任何對經濟利益的有見地估計，更有可能而形成日本的政治關係。即使新近流行的美日「連繫」口號，可是美國決不可能說服日本，採取與其民意相反的政治路線，無論是以保護主義或貿易政策的讓步作爲威脅或利誘，都做不到。美國必須記取，當我們於一九四〇年以切斷石油供應作爲威脅而阻止日本的擴張主義時，我們未能阻止日本走向戰爭，僅加速戰爭的時間而已。

我們也不能從日本經濟的錯誤觀念而作出虛假不實的結論。日本不同香港一樣，進口原料而予以改造或加工，再向世界市場銷售；日本是一個第一流的廣大壯茁的國內市場。日本也不像西德等國一樣，以其國民生產總額的四分之一作爲輸出；日本的輸出入各爲其國民生產總額的10%，尚不及其每年的增長率。當然，日本依賴原料進口，但這些大多可自「第三」世界取得，包括中國大陸在內。倘使日本發覺，它已日益爲西方市場所排擠；或者發覺，它的主要政治利益並已爲西方所損害或忽視，則日本較有可能會向開發中國家去尋求其特殊地位，而無須勉強其政策去遷就或討好美國或西方。

這並不是說，具有侵略性競爭的日本所暴露的問題不重要而不須重視。過去數年，由於我們對外貿易的平衡日見惡化，多數工商界及政府方面的美國人，對日本在國際貿易方面的行爲感覺憤怒與不快，雖則有時不免誇大其事，但無疑他們是有理由抱怨的。

可惜，美國的反應則是一項未經週詳考慮的政策。受了若干特殊工業及個人抱怨的壓力，我們經由雙邊談判而恢復了保護主義的臨時救急辦法；我們忽視了日本工業具有特殊的歷史、結構、制度及關係，要使其與西方的思想、習慣及制度適合是一項繁複的工作，無法由美國一國的努力可以促成，應由所有工業貿易國家共同努力而促成。

但，倘使把日本作爲工業競爭者的成見導致我們忽視日本的政治重要性，這僅能部份地說明或解釋過去一年我們的偏差行爲。整個說來，主要是自從白宮主理外交以來，我們對日本此一成見的形成，是由於缺少「專業精神」（professionalism）所致。

此一問題也使美國與其他世界的關係產生困擾，更使我們對日本失去控制。在白宮季辛吉的一百六十五位工作人員中，沒有日本專家；同時，由於國務院的專家已不再被諮詢，這樣為什麼我們無論在好的方面或壞的方面低估了日本的能力，是不難了解的。

還有，把日本具有威脅性的「與美國疏遠」完全歸因於白宮的遲鈍與自我為中心，未免把問題看得太過簡單；因為這也反映出美國政府「自覺的決定」(self-conscious decision)，以為日本的反應僅屬次要。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總統「五個平衡大國」的構想(the image of five balancing powers)，這是一個值得慎重檢討的問題。就今天的現實來說，在美國、西歐、蘇俄、中共及日本這五個大小與輕重頗有差異的國家之間，要來談論「齊一或真正的平衡」(a even balance)，有些近乎幻想。在這五國裏，二國具有大量核子武器的貯藏，二國具有相當少量的核子能力，一國則根本沒有核子武器；在另一方面，二國具有環球性的政治利益與活動，另三國的政治利益與活動，其範圍則是地區性的；此外，四國是工業大國，一國則是龐大的未開發國家。

即使一旦歐洲取得真正的政治統一，日本成爲一個世界性的政治力量，這五個差距相等國家的「靜態平衡」的條件也不存在。這一情況，十五世紀義大利的城邦(Italian city-states)之間是有可能的；後來的歐洲自主國家之間，也有此可能。在當時的義大利與歐洲，這些政治單元具有共同的思想與社會遺產。但尼克森總統所願見的五個平衡大國，其歷史、社會、思想及經濟的差異至深且巨，其獲致靜態平衡的條件顯不存在；即使十九世紀型的「均勢」也不存在，因為其聯盟與聯合關係也常因阻止一國獨霸他國而改變。

此外，維持或掌握此一「平衡」的樞紐國家(pivotal power)也沒有。這是過去英國所扮演的角色，把它的力量投入較弱的一方。除去共黨國家與其餘世界在思想上的基本衝突外，使美國與中共聯合以對抗日本或西歐的想法，正如日本可能與蘇俄或中共聯合以對抗西歐或美國的思想一樣，令人難以置信。因此，日本人與有見地的歐洲人解釋總統「五個平衡大國」觀念時，認其僅係意指，美國已經捨棄其基於聯盟的戰略，而傾向於「試探與獨立行動」的戰略。

美國正與日本玩弄危險的把戲

顯然，這似乎是今日白宮正在玩弄的把戲，分別與莫斯科和北平作雙邊的接觸，試圖使一方來對抗另一方，而使美國的盟國，特別是日本，自作改變。這在歐洲方面可能不至產生大害，倘使不去鼓勵歐洲每一小國，爭先恐後地試圖分別與蘇俄打交道而使西方軟弱分裂；那些樂觀者甚至希望，美國的「孤狼政策」(a lone-wolf American policy)可能加速歐洲的統一。這當然是一件好事。由於共同的制度與思想以及彼此易於商談的習尚，大西洋國家無論其聯盟制度是否制度化，它們的理想與宗旨似不至衝突。

但，日本則不然。美國與太平洋的連結是短暫性的，也是易於破碎的，在試圖獲致彼此了解上，我們遭遇許多問題。一個被美國所拒斥的日本，由它自己去找尋出路，很難像歐洲一樣，以統一來取代；日本真正唯一的出路是國家主義。

這就是作者多年來所思考的問題。美國應領先使非共的工業化國家聯合起來，首先應使美日安保條約成爲成熟的結合(a mature coalition)，然後使這一連結關係擴大而爲大西洋的夥伴關係(Atlantic partnership)，俾包括遠東與西方在這一視野以內。

此一建議的主要假定乃是，今後數年歐洲將逐漸擴大其政治視野，而恢復其對遠東事務的利益；日本則爲配合其全球性的工業任務，將擴大其以世界爲基礎的政治利益。這樣，把日本帶進現存的大西洋經濟組織而發展包括遠東在內的政治制度，在長遠方面美國可能造成一種廣大堅固的基礎；從這一基礎，美國可能找出與蘇俄及中共修好的途徑。

這是光明的前景，但很快就會消失。倘使美國堅持現行路線，則可能無挽回地失去此一機會，也許在去年已經發生。

美國前副國務卿鮑爾(George W. Ball)作
原文載：一九七二年六月廿五日紐約時報(星期六版)